

第一章 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首次使用“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一词，形容在张骞出使西域古道基础上形成的中西贸易通道^[1]。此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也经由海道。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1903年出版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国的丝绸贸易有两条商道：一是通过粟特国的陆路，另一是通过海路到达印度沿岸^[2]。这条海路在古印度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据季羨林研究，在巴利语文献，即国王弥楞陀(Menandros, 公元前125~前95年)和龙军和尚(Nagasena)的对话录“那先比丘经”中，实际上提到了一些关于印度货船远行至中国的事情^[3]。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使用，则始于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的《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4]。三杉隆敏根据中国陶瓷的海上运输和贸易分布提出这一概念，尽管他并未具体从历史学、考古学角度给予明确的学术定义，但“海上丝绸之路”简明易懂，很快为媒体和学术界所接受，并推广使用开来。

在我国，中西古代海上交通的研究由来已久^[5]，但冠之以“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以陈炎^[6]、常任侠^[7]等为代表。自198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的十年规划，并于1990年10月~1991年2月间，开展有中国学者参与的从意大利威尼斯至我国广州的海路考察活动，还在福建泉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8]，中国学术界自此掀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这一阶段，陈高华^[9]、刘迎胜^[10]、陈炎^[11]等，对海上丝绸之路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进入新千年，特别是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高潮迭至，多地相继召开学术研讨会，成立研究机构，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社会各界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给予了持续的高度关注^[12]。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纵观学者的研究，不管角度与内容如何，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都大体一致，那就是指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不过，具体到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所指及海上丝绸之路的上、下限问题，学术界仍存不少歧见。

古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东洋航路上，秦始皇时期就有徐福东渡入海求仙人和神药的传说，有秦末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以及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等记载，《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多处关于“倭”的记述，这些都证明了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13]；南洋航路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也由来已久，至晚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14]，而且“不晚于铁器时代，南中国海就一直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跨区域商贸区之一”^[15]。至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正被土墩墓等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实，其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16]。但凡上述种种，多为迁徙、战争或朝贡等，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也不固定，多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种类，归入考古学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似无不妥。

汉武帝平定南越、置合浦等九郡后，南洋航路由官方正式开通，即通常所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谶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景佑、殿本都作“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7]

这段文献所述的年代当为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主要内容是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海路交往和贸易情况，尤以使团的航线、航程和交易商品等较为详尽。我们据此也可归纳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方面特征：一是线路相对固定。从北部湾畔出发，大致沿岸前行，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二是官方主导，民间参与。黄门隶属于少府，由其下的“译长”率领，也有部分敢于冒险的商人——“应募者”加入；三是主要进行商贸活动。携去“黄金杂缯”，买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是双向行为，而非单方面输出；四是伴随着国家间的朝贡和外交活动。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但言王莽先“厚遗”，才“令遣使献生犀牛”，亦未提及对其进行册封等，故与严格意义上的朝贡制度有所不同；五是和平之路。沿途所经国家提供食物和陪同人员，甚至出现“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的友好场景。

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上、下限，也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上限，有史前说、先秦说、秦汉说、中唐说等诸多观点^[18]，但正如陆上丝绸之路（或称“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以张骞受命“凿空”西域为正式开通，上述汉武帝开通从北部湾地区出发的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象征，官方参与主导，路线相对明确固定，且对口后中外交往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上限。从这一意义上说，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无疑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西贸易的平等关系被严重扭曲，可视作其下限^[19]。在这一相对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单就贸易输出的主要商品而言，从汉代的丝绸到唐代晚期开始的陶瓷，差别很大，时代背景、航线、贸易对象、文化交流内容等亦不尽相同。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分期过细而缺乏必要性和充足依据的情况下，依笔者管见，在其前冠以朝代，如“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等表达，更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中西贸易的特性。

第二节 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学术界对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解读，最大的争议，是沿线港口和国家现今的地理位置，正谓“所难知者仅为汉使所历之国，诸国名经两千年之传写，难保毫无讹误，故历来诸考据家几人持一说”^[20]。

较早开始考证的是冯承钧，他综合藤田丰八、费琅等学者的观点，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谶离国”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的悉利城，“夫甘都卢国”在缅甸

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城，“黄支国”在印度南部东海岸建志补罗的 Conjeveram。回程经过的“皮宗”，在今马来半岛的 Pisang 岛。至于“已程不国”，冯承钧和费琅均无考，藤田丰八认为是印度南部东海岸的古里港，但后代的学者多倾向于在今斯里兰卡^[21]。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韩振华^[22]、岑仲勉^[23]、周连宽^[24] 等著名学者也曾对这些古国作过全面考释。

众多观点中，主张谿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在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的意见不在少数，因关系到航线的两个重要节点，尤应予以重视。1945 年，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发文，认为马来半岛中部狭窄地带带有若干可以便捷横断的地点，海路未必是唯一通道^[25]。稍晚，许云樵明确提出，“步行可十余日”是指弃船步行通过克拉地峡，谿离国与夫甘都卢国应分别位于地峡东西两侧^[26]。此后，保罗·惠特利 (Paul Wheatley)^[27] 等学者沿用了这一观点。

上述学者的考据，以文献释读见长，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海洋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个别学者还运用了考古资料加以佐证，但受制于当时的考古发现以及学者的学术背景，偶存资料运用不当的情况。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通过地层学、类型学等手段，研究和复原古代社会的实证学科，而沿线港口和古国作为高级聚落形态，必定有较大型的墓葬群、居住址或城市遗存，因此，从我国北部湾地区及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出土资料入手，通过物化的遗迹和遗物，厘清与海上丝绸之路记述年代相当的“点”，进一步连“点”成“线”，或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港口徐闻、合浦和日南，古国先后有都元、邑卢没、谿离、夫甘都卢、黄支、已程不和皮宗。对于沿线古国的政体，目前我们尚不明晰，芒甘 (Pierre-Yves Manguin) 甚至提出许多东南亚国家是城市国家，而非领土国家^[28]。但不管如何，那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港口城市，被认为是古代“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从考古发现出发，力争对它们现今的地理位置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一) 徐闻

徐闻为合浦郡属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29]港口的职能是囤积进出口货物，所设的“左右候官”，应是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管理外贸货物、稽征进出口商品税费等的官员，而与西北边塞的候官全面履行军事、行政和司法职能^[30]，应有所区别。黄启臣、阮应祺、张荣芳、吴松弟等学者还从历史学角度对徐闻港的重要历史地位等予以了阐述^[31]。

徐闻没有内河与内陆相通，其功能主要是作为沿海航线的补给港，货物的集散能力有限，因而决定了港口的规模不大，考古发现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1973 年冬至 1974 年春，广东省博物馆在琼州海峡北面的华丰村、红坎村和槟榔湾村三地发掘了 51 座东汉墓，并认为汉徐闻城在华丰村西南 3 千米处的七旺村一带。墓葬出土了珠饰 308 颗，包括“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32]，多与海外贸易相关。不过，七旺村一带并没有更早的遗存发现，无法显示其与西汉徐闻港之间的关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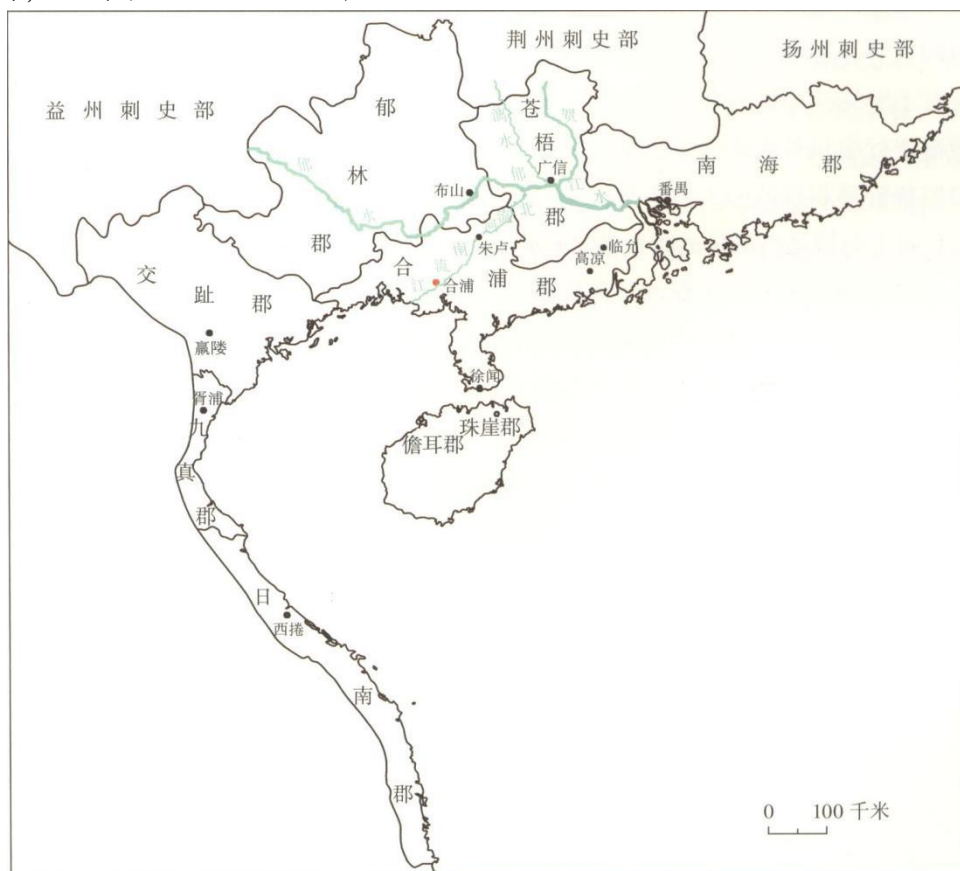
1993 年 10~11 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前期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仕尾村、二桥村和南湾村一带的汉代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墓葬、房址、水井等，出土器物以陶器和瓦类为主，也有极少的铜器、铁器和石器^[33]。发掘者把二桥村遗址年代的上、下限分别定在西汉早期和中期。

但从 2A 层出土的遗物特别是建筑材料来看，与合浦草鞋村遗址所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器物极为相似，当然，不排除这一带开发较合浦早的可能性，但与之比对的粤东地区遗址和广州汉墓，应仍存一定的滞后性。二桥村遗址地处海湾，发掘者随后撰文认为，这一带即徐闻港所在^[34]。

汉徐闻县地域广大，辖今整个雷州半岛。作者曾数度前往调查，其中在遂溪县杨柑镇、流入北部湾的杨柑河两侧，分布着多个几何印纹硬陶遗存，与合浦大浪汉城址等发现基本相类，年代也应为西汉早、中期，这些发现很值得重视。1984 年，在遂溪县郊江湾村发现一处南朝时期的窖藏金银器，出土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银币约 20 枚和 1 件莲瓣银碗等^[35]，或能从侧面说明遂溪与海外交往的传统。我们还注意到，二桥遗址仅发现小型墓葬 3 座，与居址的体量尚不匹配，发掘有待深入，而且今后寻找西汉徐闻港的考古工作，视野不妨开阔些，现遂溪县乃至汉徐闻县所辖的整个雷州半岛，都应纳入考虑之列。

(二) 合浦

合浦位居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濒临北部湾。处于北纬 $21^{\circ} 27' \sim 21^{\circ} 55'$ ，东经 $108^{\circ} 51' \sim 109^{\circ} 46'$ ，为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合浦东北与广西博白县、东南与广东省廉江市相邻，西与钦州市钦南区交界，北与浦北县、灵山县接壤，南界西段临海，中、东段毗邻其所属的北海市。县境北部为丘陵，南部为台地和滨海平原，中部为南流江冲积平原。境内河网交织，全县有大小河流 93 条，其中南流江是广西独流入海第一大河，从县东北部的曲樟乡流入，经县城后，在党江镇注入北部湾，境内干流长度约 100 千米。



图一 西汉合浦郡示意图
(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先秦时期合浦为百越地，秦属象郡，汉初为南越国辖，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始设合浦郡，属交趾刺史部，辖县五：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图一）。王莽篡位时，一度将合浦郡改为桓合郡、合浦县改为桓亭县；东汉合浦郡仍辖五县，但首县已为合浦，县名也有所变更，为合浦、徐闻、高凉、临元、朱崖。建安八年（203年）交趾立为州，合浦属交州刺史部。三国时，吴改合浦郡为珠官郡，寻复为合浦郡，领县五，晋因之。

合浦是两广入交州的枢纽，中原人交州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大都也以合浦为中转站。作为汉文明输出的前沿地带，合浦的重要地位表现为一方面接受外来商品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生产出融合当地文化特征的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甚至内陆地区流通和传播，从而推动整个文化发展的进程。与徐闻港相比，合浦港具有徐闻港无法比拟的优势，影响大于后者是显然的^[36]。《汉书》载合浦县“有关”^[37]，有学者理解为有了海关，是我国第一个海关的设置地^[38]。这里的“关”，是指置于出入要塞、负责稽查行旅和来往商贸的管理机构，主要职能还是对内^[39]，与现代意义上的行使进出口监督管理职权的海关并不等同。不过，从考古发现众多的海外文物来看，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自西汉中晚期始，对外贸易就已兴盛。

合浦港相关的考古工作，分为墓葬和城址两部分。截至2013年，合浦发掘的墓葬数量已超过1200座，其中以汉墓居多。汉墓出土文物丰富，不少与海外贸易有关，其中包括我国目前汉代考古发现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各类珠饰；城址的发掘始于2002年，时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前身）成立了“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工作重心从墓葬逐渐向城址转移，在大量考古调查的基础上，陆续开展大浪占城和草鞋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初步研究表明，两处均为汉代城址，是两汉时期合浦港的先后所在地。

有关合浦港考古发现的详细论述，将在后文展开。

（三）日南

日南是汉王朝最南的一个郡，西汉初置时，其辖境约当今越南中部的广平省至富安河一带。“自日南障塞”中的“障塞”，即边塞险要处防御用的城堡，如“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40]。《汉书·地理志》所表达之意，是指徐闻港、合浦港出发的船只自此离开国境，并不是把日南当作始发港。

越南中部开展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于东南亚金属时代的沙莹(Sa Huynh)文化，该文化是在近海的广南省发现瓮棺葬遗址后命名的，年代大致被定为公元前600~公元200年。瓮棺墓通常发现于海岸沙丘，葬具为卵形或圆柱形薄胎、带盖的瓮，瓮内随葬有玻璃、半宝石^[41]饰品、铁制和铜制工具、陶碗、陶罐等。从考古发现来看，秋盆河谷是沙莹文化遗址发现的集中地区，有会安河出海，很可能是日南的行政中心和港口所在地。

秋盆河谷主要分布有两个遗址群。一是会安遗址群，位于河流的北岸，主要有莱宜(Lai Nghi)等几处瓮棺葬遗址。在莱宜发现的墓葬共63座，出土器物非常丰富，随葬品有陶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随葬包括镜、响铃、五铢钱、手镯、容器在内的铜器以及由各种玉石、玻璃或黄金制成的珠饰和耳饰。出土的1万多颗珠饰中，肉红石髓珠就有1000多颗。从出土的肉红石髓狮形珠、青铜容器、铜镜等器物来看，多与合浦风门岭墓地西汉晚期墓相类，显示了两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结合¹⁴C测定, 莱宜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 最晚的器物年代相当于我国的东汉早期^[42]。另一是Mau Hoa遗址群, 位于河流的南岸, 其中墓地Go Ma Voi和居址Thon Tu已开展数次发掘。Go Ma Voi墓地揭露瓮棺葬约50座, 出土陶器250件, 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墓地沿用时间为公元前5~前1世纪^[43]; 在Thon Tu居址, 发现铜炉渣等当地从事青铜器铸造的证^[44]。此外, 在Go Ma Voi墓地东北数千米的查乔邨州山遗址(Bun Chau Hill, Tra Kieu), 越南和英国的考古学家也于1993年开展了发掘。该遗址出土遗物也很丰富, 主要是粗陶, 几何印纹硬陶也很普遍, 筒瓦和人面纹瓦当数量较多, 还发现少量玻璃单色珠、蜻蜓眼珠和残片等。遗址显现的文化因素复杂, 除当地占族因素外, 还有汉式印纹陶和1片印度轮制陶片。对于该遗址, “我们几乎确认沙莹史前文化、早期‘印度’因素、扩张至越南中部的汉文化及林邑国早前占族之间的‘分界面’”^[45]。Momoki也提到越南中部的占婆政权, 起到与之前沙莹文化相同的作用, 既是马来—印尼人进入中华文化圈的门户, 也是菲律宾人和越南人通往“印度化世界”的门户^[46]。类似“分界面”与“门户”的表述, 倒与日南障塞所处的位置十分吻合。

秋盆河谷出土的铜镜、铜盆和几何印纹硬陶等, 表明该地区与越南北部及汉王朝的密切一体, 而发现的大量珠饰, 显示出当地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及印度、西亚的贸易和交流体系^[47]。

(四) 都元

都元是航线经过的第一个国家, 其故地之前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二说, 各说之下又有多个不同地点^[48]。蒋国学在韩振华和程爱勤等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都元国位于俄厄(Oc Eo), 亦即越南南端的迪石一带^[49]。但发掘与研究结果显示, 俄厄遗址年代较晚, 与《汉书·地理志》记载指向的时间段并不相符。

1944年, 法国学者马勒雷(L. Malleret)开始对俄厄遗址进行发掘, 发现了许多古代建筑遗迹和遗物, 显示了这是一个进行远距离贸易及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的高度发达社会。自此, 俄厄成为越南考古文化的重要遗存, 被命名为“俄厄文化”, 其分布面积约达15平方千米。截止20世纪90年代, 发掘地点超过20处。据2002年芒甘的研究, 俄厄文化遗址可分为三期^[50]:

第一期, 公元1~3世纪。这一时期, 种植水稻, 居住棚屋, 存在骨骼经过火化的瓮棺葬习俗, 可能已经挖掘和使用运河, 扮演水陆交通的重要角色。

第二期, 约公元4~7世纪, 是俄厄港的全盛期。这一时期, 修筑了城墙和护城河, 穿过城中心的运河系统全面建成; 沿运河的平地以及Ba The Mount山坡上棚屋稠密, 较高的山丘上出现了砖砌房子, 部分砖房还辅以石头。从建筑的特征和规模来看, 不少房子也许赋予了宗教和纪念的功能。

第三期, 公元7~12世纪。遗址中可以看到许多废弃的建筑, 但在Ba The Mount地点, 还出现很多新建筑, 特别是砖结构房屋。

该遗址出土的罗马金奖章、波斯铜灯、铜镜和扶南银币等, 均属东汉及稍后的时期, 显然, 俄厄作为连接东西方海上交通和贸易枢纽, 应是公元1世纪扶南国建立后兴起的港口城市, 并非西汉中、晚期的都元国所在。

最新的发掘和研究成果, 把都元国的位置指向与越南交接的柬埔寨湄公河下游一带。这里集中发现较多公元前400~公元500年的遗址, 吴哥博垒(Angkor Borei)就是其中之一。吴哥博垒位

于茶胶省的湄公河西岸，发掘显示，最晚到公元前400年，这里已有人定居，并逐渐成为湄公河下游的聚落中心，其居住的人口于公元6~7世纪达到顶峰^[51]。另在距吴哥博垒不远、河流上游的波萝勉省村庄波赫(Prohear)，2008~2011年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属于公元前500~公元100年间的69座土坑墓和7座瓮棺葬，出土了大量遗物，包括33面铜鼓和大量的金银制品及约3000颗玻璃和石榴子石、肉红石髓、玛瑙串珠^[52]。

很多研究东南亚的学者相信，吴哥博垒之后也是扶南国的都城^[53]。我国史籍记载也指向这一带，《南齐书》曰：“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54]这里的大江当是指湄公河。《梁书》更具体了都城的位置，“城去海五百里。”^[55]按汉1里的长度等于415.8米计算^[56]，为今天的200多千米，也与吴哥博垒入海的距离相当。扶南国建都吴哥博垒之前，当地已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组织，可能即是《汉书》中提到的“都元国”。其后扶南国时期挖掘的从湄公河通往迪石湾的运河，不但沟通了湄公河下游原都元国的内河地区，而且可以绕过金瓯角，使南海与暹罗湾之间的航行更为安全和便利。

(五) 邑卢没

其故地多认为在缅甸伊洛瓦底江口至莫塔马湾沿岸一带，或谓在缅甸的勃生(Pathein)、勃固(Bago)至萨尔温江(Salween)下游，或谓在孟邦的直通(Thaton)及其附近。朱杰勤、黎光远还有一说，在泰国的曼谷湾附近的华富里(Lopburi)和叻丕(Ratchaburi)^[57]。

据我国古籍记载，公元9世纪以前在今缅甸境内建有罽国。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包括缅甸沿岸、悉利城、蒲甘城和今缅甸中部以及掸邦西南、克耶邦、勃固省、德林达依省等地都发现罽人活动的遗迹，城址有毗湿奴、汉林、室利差咀罗、迈莫、达格拉等，年代从公元1世纪晚至9世纪。其中毗湿奴代表了罽人的早期文化，室利差咀罗代表了罽人的后期文化。至于若开地区，可以肯定的是，直至公元1~2世纪，由印度逃亡来的贵族才开始在此建国^[58]。后汉称缅甸为掸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提及掸国王于公元97年、120年和131年三次遣使来汉^[59]，至少也是公元1世纪末年的事了。因此，公元前2世纪后期的邑卢没国在现缅甸境内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在曼谷湾附近所发现的铁器时代遗存，规模较大且出土遗存丰富的，迄今也仅限于班东塔碧(Ban Don Ta Phet)一处，该墓地附近一带倒有可能与这个古国有关。

班东塔碧位于泰国中西部北碧府(Kanchanaburi)和素攀府乌通地区(U-Thong)之间，经过1975~1976年、1980~1981年和1984~1985年的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墓葬出土铁制工具和武器、青铜容器和各种青铜、骨、象牙、玻璃及半宝石珠子，测试所得的平均年代在公元前396~前350年之间，是目前为止泰国确认最早的印度化遗址^[60]。

班东塔碧出土的珠子和一些青铜容器，表明了这一时期印度和泰国之间的贸易，其他比较丰富的物品，比如低温陶器、锻造的铁制工具和武器完全是本地的。班东塔碧还发现了超过3000颗的玻璃珠和玛瑙、水晶、软玉等半宝石珠子。从与两方联系的视角来看，最有趣的是绿色六棱柱玻璃饰，相似器物发现于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遗址(公元前4~前3世纪)和印度北部一些遗址以及越南俄厄遗址、泰国北部班清遗址、合浦汉墓群等，很可能是在印度制造，并由贸易进入东南亚和我国华南地区。另在班东塔碧发现50多颗蚀刻石髓珠与1件雕刻为跳跃狮子的玛瑙垂饰，几乎可以确定起源于印度。发现的软玉双头兽饰，则是越南中部海岸地区沙莹文化独特的工艺品，

这也说明了当地在东南亚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出土的青铜手镯和响铃，虽未见具体描述，但 Lam Thi My Dzung 在研究莱宜墓地类似青铜制品时，认为“有力地证实了与中国的交往”^[61]。此外，在班东塔碧还发现附着在铜器上的一些麻、棉或丝织品残留痕迹。

(六) 谶离与夫甘都卢

谶离的故地有佛统(Nakhon Pathom)、春蓬(又译“尖喷”，Chumphon)、巴蜀(Prachuab)数说；或者为缅甸东南岸的丹那沙林(又译“德林达依”，Tenasserim)；一说在缅甸伊洛瓦底(Irrawaddy)江下游地区，又有蒲甘(Pagan)附近的 Sillah、卑谬(Prome)、勃固(Pegu)、锡里安(Syriam)等不同主张；也有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部、加里曼丹岛乃至印度东北岸等说法。至于夫甘都卢国，一般认为在今缅甸西南部一带，或在卑谬(Prome)附近，或以为即蒲甘(Pagan)古称 Pugandhara 的音译，或以为在缅甸西北部若开地区。另有认为在今马来半岛北部，位于缅甸的丹老(Tanaos)或泰国的克拉(Kra)地峡附近。此外，尚有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加里曼丹岛以及印度等说法^[62]。

上文述及缅甸的考古发现，“谶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在缅甸境内的可能性均很小（不排除紧邻地峡西侧的 Maliwan 等地^[63]），倒是石田干之助、许云樵等认为位于克拉地峡两侧的观点颇有见地。克拉地峡横跨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的狭长地带，是马来半岛北部最窄处，并且它的东西两海岸皆为基岩海岸，风平浪静。顺着地势比较平坦的路线横穿，大约 100 千米，“步行可十余日”，与穿过克拉地峡所需的时间亦正相合，弃船步行至地峡的西侧后，转而海路，因而才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有西方学者估计，弃船步行可节省 4 个月，不失为一捷径^[64]。这一分析结果吻合文献记载，也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克拉地峡两侧，考古发现了众多的遗址。东岸春蓬府发现的三乔山遗址(Khao sam Kaeo)，出土了西汉铜镜、印纹陶器和印章及印度风格的轮制陶器^[65]。该遗址的珠饰原料包括高品质石髓(数量最多)、玛瑙、玉、紫水晶、白水晶和比较罕见的石榴子石，在遗址中发现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加热与未加热的原材料、粗坯、初加工的成品、未穿孔也未磨制的装饰品、废品和一些可以认为是出自学徒之手的残片^[66]。三乔山的年代从公元前 4~前 1 世纪，是东南亚已知最古老的城市及印度和东南亚之间贸易的一个早期重要连接点，考古学家还注意到了三乔山与班东塔碧的密切联系^[67]。西岸潘牙府(Phang Nga)库拉武里区邦罗村(Kuraburi-Bang Ro)，大面积发现玻璃珠和宝石珠，还有陶器和其他汉式器物，可能是托勒密地图中提及的达构拉贸易港(Takola Emporium)^[68]。其北面还有著名遗址 Phu Khao Thong，泰语意为“金丘”，曾出土大量金器。Phu Khao Thong 遗址是南亚方向来船登陆的首站，它与三乔山遗址一样是转口港，¹⁴C 年代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 200~公元 20 年之间^[69]。毫无疑问，克拉地峡在汉代时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谶离与夫甘都卢国则分别位于地峡两侧，应比较确信。

(七) 黄支

黄支通常被认为在印度东南部泰米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其南面约 100 千米有著名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遗址。1996 年，贝格利(Vimala Begley)发表其发掘报告，报告中对既往发现进行回顾，还谈及了不少新认识^[70]。

遗址位于本地治里(Pondicherry)以南 2 英里处、阿里亚卡帕姆(Ariyankuppam)河右岸，濒临孟加拉湾。1941~1944 年间，法国学者儒沃-杜布雷耶(Jouveau-Dubrui)对阿里卡梅度遗址进行

了小规模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安佛拉式罐，将这里描述为一个“罗马城市”；1946年，莫蒂默·惠勒 Mortimer Wheeler)对遗址的发掘，在印度和西方最为人所熟知，他绘制了遗址及周边区域的等高线图并发表在报告里，将这里称为“印度—罗马交易站”1947~1950年，卡赛尔(J. M. Casal)继续对这个遗址进行发掘；1989~1990年及1991~1992年，贝格利进行了第三期的发掘。

莫蒂默·惠勒的考古发掘将遗址分为北区和南区两部分，贝格利也保留了这样的划分方法。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区域的定居范围在整个贸易时代都在扩大，刺激增长的动机显然是商业。

南区出现最多的建筑形态是用砖块垒砌而成的围墙，早期的发掘者认为是贮水池，但可能更具商业用途，比如存储工业或农业产品。卡赛尔发现一些小型作坊沿着贮水池北墙分布，里面出土有金属器及玻璃、半宝石、象牙和贝壳等装饰品。南区最重要的发现还有陶器，出土大量的罗马赭色黏土陶器碎片以及多种形制的其他陶器器皿，表明南区存在居住区、工业区和市场；北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港口设施所在地。莫蒂默·惠勒发现了使用砖砌的围墙，他认为可能是仓库遗址。他还发现了残存的木材、绳子和其他材料，因此认为早期的港口设施是木结构。贝格利还发现了水井。出土物中最多的陶器残片，集中于北区的最北区域，器类较多，有烹饪器皿和餐具盘、碗。地层里发现了罗马赭色黏土陶器和安佛拉罐，证明这一地层堆积年代为地中海贸易时期。因此，如果北区的最北区域是港口，那么这里的一些空间可能居住着商人或水手。此外，日常使用的陶器有粗陶器和细陶器之分，表明存在社会或经济分层。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再次兴起对阿里卡梅度的研究热潮。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成果，使人们对阿里卡梅度遗址有了更多认识。其中包括小彼得·弗朗西斯(Peter Francis Jr.)对珠饰的研究；约翰昆内特(John Gwinnett)、戈雷利克(Leonard Gorelick)对珠子技术的研究；玛丽安(E. Marianne Stern)对罗马玻璃制品的研究，以及贝格利对古聚落年表及其出土陶器的研究。贝格利认为，尽管阿里卡梅度的海外贸易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就开始，并持续到公元1世纪或2世纪初期，但黄金时期却是从公元前1世纪中期到公元1世纪中期。

阿里卡梅度是当时的贸易大港，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提到的著名港口波杜克。不过，由于阿里卡梅度遗址的发掘历时较长，出土资料收藏分散，部分甚至可能遗失或被遗弃。在数量可观的陶瓷器残片中，有来自中国或者其他东亚国家，但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研究，正如贝格利指出，在他们的工作团队中，还缺乏一位中国及东亚陶瓷器专家，因此对这些陶瓷片的鉴别和精确断代暂时阙如。

除阿里卡梅度外，泰米尔纳德邦滨海还有卡里卡度(Karikadu)、阿拉干库兰(Alagankulam)等重要港口遗址发现^[71]。从这些港口遗址的遗存中可以看出，用半宝石和玻璃进行珠子加工是一项重要产业，卡里卡度遗址还发现玻璃加工所用的红陶管、坩埚和废弃的炉渣。阿拉甘库兰遗址位于阿里卡梅度以南约300千米的韦盖河(Vaigai River)河口，在韦盖河谷地发现以Keeladi为代表的始于公元前300年的众多遗址，出土铜器、陶器以及大量的玻璃、陶球、珍珠、象牙、石英和多种半宝石制品，反映出与罗马及南部斯里兰卡贸易的密切关系^[72]。从上述港口所处位置来看，亦有可能为汉使团所经停。

(八) 已程不

已程不国故地多谓在今斯里兰卡，当时主要港口在今曼泰(Mantai)一带。曼泰坐落在斯里兰

卡西北角，以保克海峡(Palk Strait)与印度次大陆相隔。保克海峡平均水深2~3米，最深仅9米，海底有许多暗礁相连，也称“亚当桥”(Adam's Bridge)。

曼泰的战略位置尤为引人注目，它雄踞近东与远东之间主要的航海通道，同时又是印度南部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一个主要接触点。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下，这个遗址对任何有关印度洋贸易及亚洲经济史的研究都非常关键，就海上贸易而言，曼泰的地位独一无二，而且作为斯里兰卡主要港口的地位至少保持了1500年。当其全盛之际，曼泰的重要性除了源自它位于亚当桥东侧连接斯里兰卡岛的关键位置，还来自于它通过阿鲁维河(the Aruvi Ari River)与都城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建立的共存共荣关系。

在文献中，曼泰港被称为“马提塔”(Mahatittha)“曼陀坦”(Mantottam)或“马陀塔”(Matota)。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就被认为是一处极其重要的遗址，零星的试掘早已开展，之后的1980、1982和1984年，共进行了三期发掘^[73]。

曼泰遗址大片区域内废弃堆积厚达10米，为遗址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可能。考古发掘显示，遗址的最早阶段属史前时期，年代为公元前二千纪初。此后遗址一度遭到废弃，掩盖在厚厚的流沙之下。人类的第二次定居似乎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并一直持续到公元11世纪。

曼泰从事国际贸易的更多证据在出土器物中得以体现，这些出土器物显示了东西方间的交流。曼泰以东是马纳尔湾著名的珍珠海岸，珍珠始终是当地主要的出口商品，完整的和经钻孔的珍珠在发掘中均有出土。根据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参考文献，该岛一直以开采和出口各种宝石、半宝石而驰名。在曼泰，这些宝石既有加工成品出土，也发现了未经琢磨的原石。曼泰的珠子提供了对外交流的有力证据，彼得·弗朗西斯分类整理了各等级标本2500余件，在用料、制造技术和跨地区传播上，它们展现出广泛的多样性。毫无疑问，曼泰曾是一处重要的珠子产地，尤其是对印度一太平洋珠而言。制造这种玻璃珠的最早记载是在阿里卡梅度，在曼泰的生产则持续了一千多年。这种珠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西至东非，东至朝鲜。上述宝石和玻璃珠饰，也是出口到汉王朝的主要器物。曼泰最古老的进口珠中，马赛克蜻蜓眼式玻璃珠是罗马帝国的产品，在德国出土的罗马珠子中已经发现了类似的标本。还有一种时代相近的珊瑚珠，是西方出口到印度的主要商品之一，也许罗马人用它们来换取珍珠。进口珠还包括青金石珠，其原产自阿富汗。曼泰有很多珠子，譬如红玉髓质地的，都能与印度的

类似出土物找到关联。印度式陶器，如磨光红陶器的大量出土更进一步证实了曼泰与印度的关系。但迄今发现的中国器物，则多晚至唐代。白瓷和越窑瓷器的碎片较为常见，烧制于长沙窑的典型釉陶侈口壶，常装饰有模印浮雕贴片，表现葡萄串、鸟类、狮子和其他动物，还有头戴塌软帽子的西亚胡人形象。曼泰还出土了典型的三彩陶片和一种带绿釉散点装饰的器物，它们同样产自中国。

曼泰港之外的斯里兰卡其他地区，南部Rambukkana遗址发现中国丝绸，经¹⁴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74]；在东南沿海的沉船遗址Godawaya，还发现从印度贸易而来的玻璃锭等^[75]。这些发现，折射出已程不国对外贸易的发达和兴盛景况。

(九) 皮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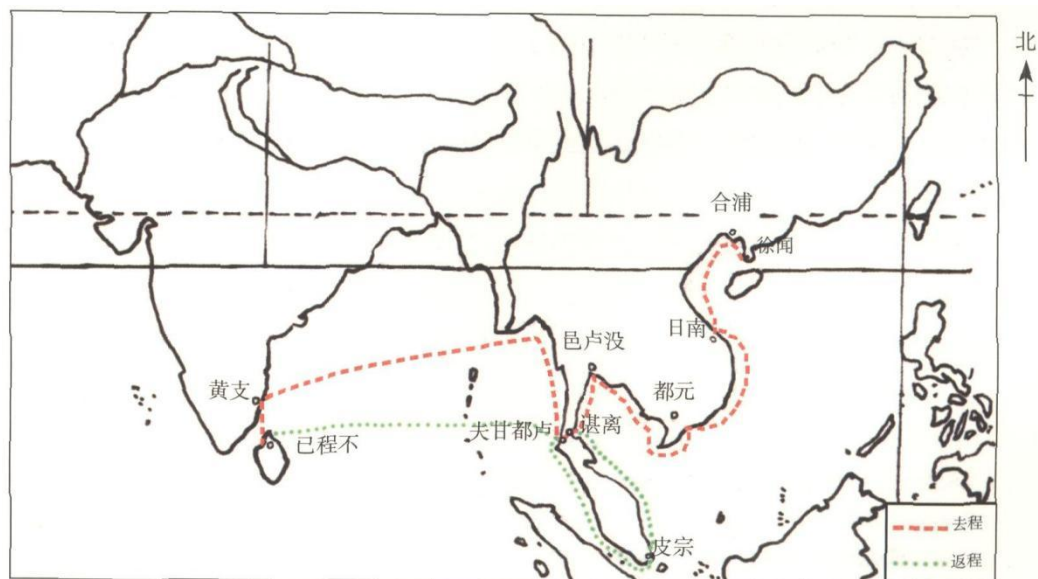
皮宗故地，有如下数说：指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岛，或泛

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或指泰国北大年一带,还有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Peusagan河流域、马来西亚的檳榔(Penang)屿、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帕克强(Packchan)河口、越南南端的金瓯(Ca Mau)角及附近的Byong岛或Panjang岛等说^[76]。

香蕙岛的观点提出较早,引用亦多。这个仅154公顷的小岛,迄今尚无任何考古发现的报告,当时是否有固定的居住人群,也尚未可知。而在整个马来半岛西海岸,最重要的遗址有拉瓦海岬(Tanjung Rawa)、瓜拉士林星(Kuala Selinsing)和霹靂州(Perak),年代都较晚,14C测年表明遗址的年代从公元3世纪至7或8世纪,与考古发现基本一致^[77]。

我们认为,《汉书·地理志》把“皮宗”单独置于回程路线中提及,其位置应是在去程未经过的克拉地峡以南,方符合汉语表述的先后顺序和习惯。从考古资料来看,在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可能性比较大。

在柔佛河上游和中游一带,分布着许多出土中国陶瓷片的古代遗址,其中最出名的为哥打丁宜(Kata Tinggi)。哥打丁宜位于柔佛河中游,马来语的原意为“高城寨”或“高港”,该地为公元16~18世纪柔佛王国的都城旧址,在这里出土过唐宋瓷片,尤以明代瓷片为最多,以印纹陶为代表的古代陶片,也有发现。韩槐准收集了一批共164片陶片,除哥打丁宜出土外,还有马六甲的3片,根据质料和纹饰,分为印纹陶和划纹硬陶两个系统,以印纹陶居多。安志敏研究认为,印纹陶是在邻近地区文化影响下在当地制作的,划纹硬陶很可能是通过贸易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输入,年代应为公元1~3世纪^[78]。此类划纹硬陶,普遍发现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使用年代跨度很大,上限可至春秋战国,以此考量,柔佛出土的这批陶片,年代或许更早,早至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汉武帝时期。



图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上述东南亚和南亚的遗存,尽管还不足以全面复原这些古国的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通过对考古出土资料的梳理和初步研究,我们仍能以之框定所经古国的大致位置,把航线的一些关键节点连接起来,从而勾勒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示意图(图二)。因汉代的船只较小,难以抵御巨大的风浪,故在北部湾一般是沿岸航行,而在孟加拉湾,斯拉·崔帕提(Sila Tripati)

指出，公元45~47年希帕罗斯(Hippalus)发现季风之前，印度往来于东南亚的贸易就已经利用不同季节的风向，穿过安达曼群岛北侧或十度海峡，远离海岸往返航行^[79]。由于孟加拉湾北岸的缅甸和印度若开地区等，迄今还没有报告公元前2~前1世纪的考古遗存，故此说应较为可信。汉使团的返程，在马来半岛一段不再走穿过克拉地峡的陆路，而是走海路经马六甲海峡绕过半岛。这一变化，可能是基于交往的需要，更有可能出于贸易利益的驱动。克拉地峡以南的泰国南部，比如孔通的Khuan Luk Pad和塔差纳(Tha Chana)等，以盛产珠饰而闻名^[80]。这一带，在南亚与东南亚、东亚的奢侈品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后，我们须强调的一点是，这是汉使团航行经过的完整路线，但在日常民间贸易中，“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余”^[81]，长距离运输是不切实际的，因而大多为接力式的就近贸易。由此，也不难理解，这一官方航线之外的番禺以及可能因不是始发港的交趾，没有在《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中提及。前者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为“都会”^[82]，后者著名历史学家马雍概括为：“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83]。从文献记载和两地出土众多的舶来品仍可看出，当时可谓商贾云集，域外物产荟萃。毫无疑问，作为汉王朝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交趾和番禺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往中，地位极其显要。

第三节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与历史地位

目前学术界认为丝绸之路主要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通过张骞的出使，旨在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以民间商贸活动为主的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草原丝绸之路因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形成，早期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这条路就变成一条“辅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商贸活动，也有政府主导的个别“朝贡”“外交”以及“文化交流”^[84]。可见，丝绸之路各路线在汉代的对外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从长安出发经由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关乎国家安危，皇帝和朝廷极其重视，从而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沿这一线路，中外交往密切频繁，物质和文化交流层次广泛，直接连接京畿地区，影响巨大，而且史料记载丰富，沿线遗存众多且保存较好，考古工作开展较早，中外学者普遍关注，如此等等，都奠定了其在学术界及社会上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但是，通行货物或往来人数，并非考察一条路线重要与否的唯一标准。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象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撒播”^[85]。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正史记载的第一条官方远洋航线，尽管其规模有限，不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使者相望于道”^[86]“殊方异物，四面而至”^[87]，也很难出现舟楫相连、商贾喧阗的场景，但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它不仅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科技传播，形成了汉王朝对外海陆交往的格局，而且在汉代之后，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发展，海路贸易的持续扩大与繁荣，其历史基础也正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因此，我们认为，相较于陆上丝绸之路，它之前并未获全面而客观的评价^[88]。

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均是连接汉王朝与罗马、连接东方与西方的主要通道。汉代海上丝绸之

路止于南亚，在印度、斯里兰卡一带与罗马进行间接贸易，而沿陆上丝绸之路与地中海地区的交往，也大都以帕提亚（古称“安息”）商人为中介。若要抵达罗马，最后一段还是得走海路，“自此（指帕提亚帝国的西界）南乘海，乃通大秦”^[89]。海上丝绸之路返程抵达北部湾的合浦等地后，辗转通往京畿地区，从这一意义上说，与陆上丝绸之路可谓殊途同归。之前长安城的一些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与东南亚交往密切的证据，如1975年西安南陵丛葬坑出土的犀牛骨骼，经鉴定为爪哇岛的独角犀^[90]；出现在汉长安百戏中的“寻撞”——人手持或头顶长竿，数人缘竿而上的杂技艺术，来自南洋地区^[91]。相较于陆上路线，海上航线或更为经济和便利，故罗马帝国与汉王朝最终实现官方的直接沟通，走的是经由日南郡的海上航线^[92]，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93]。林英也通过对《后汉书》以及魏晋南北朝诸史中的大秦传等文献的研究，得出这些反映公元1~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了解的记载，在公元2世纪中叶之后，是通过南印度和南海路传入中国的结论^[94]。由此可见，海路交往并不完全是陆路的补充，至少是发展到东汉时期，其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已日渐凸显。

西南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也很密切。“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积极地参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系构成欧亚大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95]，三国时期鱼豢所著的《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96]，这里的水道即红河，这一路线又称为“蜀交趾道”。交趾郡是中西交汇前沿的大都市，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就达到746230人^[97]，甚至超过了京兆尹，而西南的益州郡、蜀郡、巴郡也是人口集中的繁华之地，加之盛产丝绸，两地贸易的互补性强。西南地区通过交趾，与合浦等沿海地区交往，甚至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继续南行，实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直接贸易，参与到中西海上贸易的网络中去。有学者指出：“孤立地研究南海道或缅甸道，把中国南方地区对外关系的有机整体，人为地割裂为‘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是不恰当的，是不能把握汉代对外交往历史规律的”^[98]。诚如斯言，考古发现表明两路的沿线地区交流密切。西南地区发现的许多珠饰，包括蚀花肉红石髓珠、琥珀珠、印度—太平洋珠等，在东南亚、南亚同期或更早些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多相同或类似的器物出土，应有相当部分是通过蜀交趾道输入；杨勇通过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与岭南地区尤其是合浦汉墓出土铜器、陶器等进行比较，发现黑蚂井墓地有相当一部分器物是岭南尤其是合浦等地汉墓中所流行的器类或器形，故认为墓主从岭南迁徙而来，从事铜、锡等矿产资源开发是其主要目的^[99]。从合浦沿海至交趾，再通过蜀交趾道抵达黑蚂井一带，或是其迁徙的便捷路线。

综上所述，不管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抑或西南丝绸之路，均非截然分开，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代中西贸易交往的庞大网络，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 [1] Richthofen, F. F. 1877.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 Volume 1.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 pp. 496-501.
- [2] 爱德华·沙畹著, 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年, 第208页。
- [3] 季羨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67页。
- [4] 三杉隆敏:《海シルクロードをめぐっ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 大阪: 创元社, 1968年, 第6~9页。
- [5] 较早有冯承钧1937年出版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8年影印版), 系统辑录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 中华书局, 2003年)。
- [6] 陈炎:《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 [7] 常任侠:《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年。
-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
- [9]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年。
- [10]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 [11] 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 [12] 耿升:《2001年海上丝路研究在中国(上)》,《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2001年海上丝路研究在中国(下)》,《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 戚文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 [13]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202~207页。
- [14] 傅宪国:《论有段石铎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 [15] Hsiao-chun Hung, Kim Dung Nguyen, Peter Bellwood & Mike T. Carson, 2013. Coastal connectivity: Longterm trading networks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Journal of Island and Coastal Archaeology, 8:3, pp. 384-404. 文中提到的铁器时代, 始自公元前500年的沙莹文化。
- [16]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人南迁》,《考古》2016年第8期。
- [17]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671页。
- [18] 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理论参考》2014年第9期。
- [19] 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年。见“前言”部分。
- [20]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年影印本(原书1937年出版), 第2~3页。
- [21] 苏继庠:《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第5卷第二辑(1948年), 第1~4页。
- [22]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未段考释》,《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 [23] 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
- [24] 周连宽:《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
- [25] 转引自周长山:《日本学界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2期。原文载:《南海に関する支那史料》, 东京: 生活社, 1945年, 第18~20页。
- [26] 许云樵:《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第5卷第二辑(1948年), 第26~37页。
- [27] Paul Wheatley, 1961.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 D. 1500. Kuala Lumpur: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pp. 8
- [28] Manguin PY, 2000. City-states and city-states cultures in pre-fifteen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 In boo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rty City-state Culture. Edited by MH Hansen. Copenhagen: Historisk-filosofiske Skrifter, R. Danish Acad. Sci. Lett. pp. 409-416.

- [29]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7页。
- [30] 方孝坤:《侯官职能述补》,《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 [31] 黄启臣:《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阮应祺:《汉代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 [3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 [3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34] 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
- [35]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 [36] 邓家倍:《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0期。
- [37]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0页。
- [38] 王杰:《汉代交州合浦港口的兴起与对外贸易》,《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 [39] 彭年:《汉代的关、关市和关禁制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 [4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祭彤传》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44页。
- [41] “半宝石”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商业名称,但在西方文献中常常使用。为忠于原著,本书予以沿用。半宝石包括合浦汉墓出土的石榴子石、水晶、玛瑙、肉红石髓、绿松石以及绿柱石类的透绿宝石、金绿宝石和海监宝石等珠饰。此外,有机宝石珍珠、琥珀也归入半宝石。
- [42] 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著,杨勇译:《汉代南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从越南和柬埔寨考古新发现谈起》,《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51~456页。
- [43] Andreas Reinecke, Nguyen Chieu & Lam Thi My Dung, 2002. Go Ma Voi: The New Discoveries of Sa Huynh Culture. Cologne: Linden Soft.
- [44] Lam Thi My Dung, 2000. Some Archaeological Issues on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Sa Huynh to Champa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he Central Vietnam.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ject OQ: 03.15.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Vietnam (in Vietnamese).
- [45] Ian C. Glover, Mariko Yamagata & William Southworth, 1996. The Cham, Sa Huynh and Han in Early Vietnam: Excavations at Bun Chau Hill, Tra Kieu, 1993.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14. Chiang Mai Papers, Volume 1. pp.166-176.
- [46] Momoki, S. 1999.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ampa studies. In book: The Dry Areas in Southeast Asia: Harsh or Benign Environment, Edited by Fukui Hayao.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pp. 65-74.
- [47] Lam Thi Dzung, 2009. Sa Huynh 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Thu Bon valley, Quang Nam province, central Vietnam.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9. pp. 68-75.
- [48]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3~644页。为叙述方便,下文诸家观点不一列出,均引自本书。
- [49] 蒋国学:《〈汉书·地理志〉中的都元国应在越南俄厄》,《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
- [50] 转引自 Andreas Reinecke (ed.), 2015. Perspectiv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Vietnam.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Hanoi 29th February-2nd March 2012. Bonn. pp.211-214.
- [51] Miriam T. Stark & Bong Sovath, 2001. Angkor Borei recent research on emergent complexity

in Cambodia's Mekong,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Bulletin 21, Melaka Papers, Volume 5. pp. 86-98.

[52] Andreas Reinecke, Vin Laychour & Seng Sonetra, 2012. Prohear-An Iron Age burial site in southeastern Cambodia: Preliminary Report After Three Excavations. In book: Crossing Border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ists, Volume 1. Edited by M. Tjoa-Bonatz. A. Reinecke & D. Bonatz. Singapore: NUS Press Pte Ltd, pp. 268-284.

[53] Miriam T. Stark, 2003. Angkor Borei and the Archaeology of Cambodia's Mekong Delta, Art & Archaeology of Funan, Bangkok: Orchid Press. pp. 89-105.

[54] (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4页。

[55] (唐)姚思廉:《梁书·扶南》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87页。

[56] 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7]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1页。

[58] 梁志明、李谋、杨保筠主编:《东南亚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5~182页;

Elizabeth Moer, 2009. Place and space in early Burma: A new look at "Pyu Culture".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ume 97.

[59]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八十六,第2851页;《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卷六,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60] Ian C. Glover, 1996.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book: Ancient Trade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Nandana Chutiwonggs, ect. Bangkok: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pp. 57-94.

[61] Lam Thi Dzung, 2009. Sa Huynh 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Thu Bon Valley, Quang Nam Province, Central Vietnam. Bulletin of the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 29. pp. 68-75.

[62] 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15、172~173页。

[63] B. Bellina, etc. 2018. Myanmar's earliest Maritime Silk Road port-settlements revealed. Antiquity, Volume 92, Number 366. pp. 1-5.

[64] B. Bellina, P. Silapanth, B. Chaisuwan, etc.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polities in the upper Thai-Malay Peninsula in the late millennium BCE. In book: Before Siam: Essay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Edited by N. Revere & S. Murphy. Bangkok: River Books. pp. 69-89.

[65] Mercedes Murillo-Barroso, ect. 2010. Khao Sam Kaeo: an archaeometallurgical crossroads for trans-asiatic technological tradi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7. pp. 1761-1772.

[66] B. Bellina, 2014. Maritime Silk Roads' ornament industries: socio-political practic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transf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4. pp. 345-377.

[67] Ian G. Glover & B. Bellina, 2011. Ban Don Ta Phet and Khao Sam Kaeo: The earliest Indian contacts reassessed. In book: Early Indian Influences in South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ross-cultural Movements. Edited by Pierre-Yves Manguin, A. Mani & Geoff Wad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 17-45.

[68] 碧姬·博雷尔(Brigitte Borell):《早期北部湾地区的汉代玻璃器皿》,《海洋史研究》(第四辑)第27~4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班查·彭帕宁著、林璟玟译:《璀璨·古珠·天珠》(Beyond

Beads), 台湾: 维他命文化有限公司, 2013年, 第103~106、137~151、177~182页。

[69] Cristina Cobo Castillo I, B. Bellina & Dorian Q Fuller, 2016. Rice, beans and trade crops on the early maritime Silk Route in Southeast Asia. *Antiquity*, Volume 90, Number 353. pp.1255-1269.

[70] Vimala Begley, etc.1996. The Ancient Port of Arikamedu: New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es 1989-1992. Paris: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pp.93-108.

[71] K.V. Raman, 1991. Further evidence of Roman trade from coastal sites in Tamil Nadu. In book: *Rome and India: the Ancient Sea Trade*. Edited by Vimala Begley & Richard Daniel De Pum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25-133.

[72]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Roja Muthiah 学术图书馆馆长 G. Sundar 提供的会议邀请资料。

[73] John Carswell, 1991. The port of Mantai, Sri Lanka. In book: *Roman and India, the Ancient Sea Trade*. Edited by Vimala Begley & Richard Daniel De Pum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97-203.

[74] 查迪玛(A.Chandima):《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古代中斯贸易关系》,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第113页。

[75] R. Muthucumarana, A.S. Gaur, etc. 2014. An Early Historic Assemblage offshore of Godawaya, Sri Lanka:Evidence for Early Regional Seafaring in South Asia. *J Mari. Arch.*, V01.9 (1). pp. 41-58.

[76] 陈佳荣、谢方、路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年, 第285页。

[77] Ian C.glover, 1996.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book: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A.Srisuchat.Bangkok: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pp. 57-94.

[78] 安志敏:《马来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考古》1965年第6期。

[79] Sila Tripathi,2011.Ancient maritime trade of the eastern Indian littoral.*Current Science*, Volume 100,Number 7.

[80] Ian C.glover, 1996.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early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In book: *Ancient Trades and Cultural Contacts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A.Srisuchat,Bangkok: The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Commission. pp. 57-94. 班查·彭帕宁著, 林璟玟译:《璀璨·古珠·天珠》, 台湾: 维他命文化有限公司, 2013年。

[81]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3271页。

[82]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 珠玑、犀、磬瑁、果布之凑”(《史记·货殖列传》,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3268页);“(粤地)处近海, 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 其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1670页)。

[83]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年, 第53~54页。

[84] 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85] 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著, 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 第297页。

[86] (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3170页。

[87] (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卷九十六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年, 第3928页。

[88] 长期以来, 狭义的丝绸之路, 学术界多指陆上丝绸之路。近有学者撰文, 认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首先是汉武帝派遣使节搜求奇珍异宝的结果, 一开始并不是一种经济行为, 汉武帝的重视程度也十分有限; 使节所走的商路, 并不具有张骞通西域那样的“凿空”性质, 之前南洋和西洋的商人已经经此往返; “海上丝路”的开通, 实际上是中外政府和商人双向努力的结果, 外国方面可能贡献更大; 由于汉政府的有意

限制，以及贸易商品主要局限于高端奢侈品，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很小，没有对岭南社会的经济文化面貌造成很大影响。参见陈洪波：《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再思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0期。

[8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90] 王学理：《汉南陵丛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丛谈》，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91]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3页。

[92] 《后汉书》中也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西域传》）以及“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和帝纪》）的记载，林梅村、杨共乐认为是公元100年罗马商团来到中国的史实，张绪山则认为很可能只到西域都护一带，而非洛阳。笔者赞同张说，《西域传》下文有经由日南郡的海上航线“始乃一通焉”的表述，很难理解为著者笔误。具体讨论，参见：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杨共乐：《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杨共乐：《“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张绪山：《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9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两域传》卷八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0页。

[94] 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

[95] 霍巍、赵德云：《战同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第9页。

[96] 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2页。

[97]（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29页。

[98] 周永卫：《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2007年，第349~355页。

[99] 杨勇：《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10期。该文引“1984年在合浦县一座编号为零号的东汉墓中也出土2件（铜凤灯），其造型与望牛岭西汉墓出土的完全一样”（覃芳：《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及工艺艺术》，《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该引文内容不实，合浦汉墓出土的铜凤灯（或称雁灯），仅望牛岭M1的2件。